

浦东风来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

(上接第十三版)

邓小平已经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这意味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南向北转移。这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转移。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新阶段。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急需在整体思路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在地域上需要一个带动力强、腹地广阔、对国内外可产生巨大带动效应的城市或地区进行更大程度的先行开放试验,以此来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邓小平的视线越过层层迷雾,穿透历史和未来。一种崭新的思路在他心中形成:浦东开发开放要成一项跨世纪国家战略。

经历过战争年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邓小平深知战机稍纵即逝。满弓搭箭,总设计师期望浦东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强力的箭头。

1990年4月18日上午,风和日丽,湛蓝的天空飘着一丝白云。历史意义的一刻来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向世界“借脑”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东后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这是浦东的骄傲,也是联合国的光荣。我祝你们成功。”

浦东究竟应怎样开发?早在1989年10月26日,上海市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朱镕基就提出:“上海的发展一定要考虑面向太平洋、面向未来,各种基础设施的布局一定要按这个要求。”

1990年12月,朱镕基主持了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审议会,并计划先从黄浦江边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打造一个集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相融合的海上新标志地区。为此,浦东率先向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征集规划设计方案。



1990年5月,从浦西看浦东陆家嘴。

(资料图片)

1992年11月20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三楼,5个精心制作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区域的规划模型摆放在中央,世界顶级规划设计大师们围着模型而坐,各抒己见。

经过17轮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产生第一个汇集国际智慧的规划方案。

这样的国际招标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突破。有很多人表示怀疑:“一个城市的规划,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当时是否触动了‘红线’?”

浦东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李佳能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城市的设计规划通常被认为是“保密”的,参与设计人员都有严格的要求,更别提花大价钱请外国人去设计和规划。

还有人认为这费时间,而且还很花钱,没有什么必要。比如,浦东那条著名的世纪大道,是邀请了多方设计机构竞标,最后由法国人中标,当时也受到质疑:就造一条马路也要外国人来设计,花费上百万?

又比如,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人无不赞叹陆家嘴中心区域的一大片绿地,草地、阳光、蓝天、湖水,草地上散落银杏树叶,鸟儿从空中掠过。

不过大片绿地的建造最初也有着理念冲突。那是1992年冬天,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会在上海举行。英国、法国的两位专家陈述了自己的设想:“陆家嘴四周是建筑群,中间建一块圆形的绿地,让人与自然融合,置身于大自然的环抱当中。”

有人问道:“建中心绿地需多少土地?”

外国专家回答:“要占地10公顷。”

一时间,会场震动了。陆家嘴是一块黄金宝地,在这里发展房地产必将产生黄金收益。而在此建绿地,不仅赚不了钱而且还要投钱!

“这样的想法,何止是设计上的突破,更是观念上的碰撞,在场的人有些坐不住了。”李佳能回忆说。

但通过国际招标后,浦东建设者在与外方的交流中达成了共识,高楼林立的金融贸易区



图为杨浦大桥建成不久后拍摄的照片。杨浦大桥于1991年5月1日开工,1993年9月15日建成通车,总投资13.3亿元,是连接浦东、浦西两岸的重要交通纽带。(资料照片)

不能只有“水泥森林”没有绿荫。

后来,这块绿地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绿地,在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中就像一块绿宝石镶嵌其中。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东后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这是浦东的骄傲,也是联合国的光荣。我祝你们成功。”

要不要发展第三产业

1995年12月20日,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合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东开张,107万顾客顶着凛冽寒风,潮水般涌入商场。

曾经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中的“破冰之旅”,那么浦东开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攻坚之役”,是改革开放总体上的升级。

浦东开发启动后,这种攻坚首先体现在浦东选择了第三产业实现突破,通过集聚要素市

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上海的要素市场建设也高潮迭起。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石油交易所也一一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亮相,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初步为上海搭建起了全国性的金融体系。

第二个时刻是1995年12月20日,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合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东开张,107万顾客顶着凛冽寒风,潮水般涌入商场。这一数字,也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上海第一八佰伴开业之前,中国国内商业界里并没有外国投资者涉足,上海第一八佰伴打破了中国商业界中资经营一统天下的局面。

如果再将历史的镜头拉远一点,更能看清楚浦东发展第三产业,集聚要素市场的意义。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不过,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如何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人并没有经验。上海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很自然地借助浦东开发将发展和培育要素市场,作为重点突破口。

多年后,曾有记者描述了浦东的要素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表现:北京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九时一刻,总部设在上海浦东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随着交易员轻轻敲击键盘,一组数据即刻传遍全球。一刻钟后,另一组令人关注的数字又从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传出。

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员、进出口商及投资者们都会在这个时候,



1998年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现规模。

(资料图片)

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了“惊人一跃”。

今天“第三产业”这个名词,人们耳熟能详。但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之既陌生又疏远。“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思想不通,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就连当时的统计指标也只有工农业产值,而没有一个关于第三产业的。”姚锡棠说。那时候,对于是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领导和学者们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话题。

这并非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在中国发展第三产业并不容易,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拷贝苏联模式,一向是以工业为中心,而且是以重化工业为重。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也以第二产业为主,尽管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第三产业的绝大多数行业还处于对外封闭状态。

在“三个先行”方针指导下,浦东有了中国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家金融贸易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第一家外资银行落户,等等。第三产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中,有两个时刻体现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惊人一跃”。

第一个时刻是1990年12月19日11时,在欧式风格的浦江饭店内,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敲响了开市铜锣,一时国内外反响强烈。将早已撤掉的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显示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上海重塑金融中心的决心。

就成为必须。那么,盖什么样的楼?浦东的投资者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进行中外文化的融合就成为建设者所考虑的。

1992年, 外贸部打算在浦东找一个最好的地方,为各家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盖一幢“中华第一高楼”。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沿江核心区, 要建88层, 420米。

浦东要建“中华第一高楼”也吸引了全球建筑师的目光。1993年2月,浦东正式面向国际开始了金茂大厦设计方案的招标。众多实力雄厚的建筑事务纷纷来到上海。9家设计机构投入了竞争,其中有日建、波特曼、SOM,都是国际顶尖的建筑设计巨头。

SOM是世界超高层的权威设计机构。但日建也志在必得,光准备方案,就花掉了100万美元。投票表决那天,12位评委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建和SOM的两个方案上。最后来自日本的黑川纪章却把手头的一票投给了SOM,他说:“要是日建获胜,那么我会觉得耻辱,因为SOM的方案太出色了。”

SOM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是把中国文化之精髓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大楼。美国设计师接手了这个项目的投标任务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现代超高层建筑与中国历史建筑文脉相沿袭。他们在中国大江南北寻找了大量古代高层建筑的式样,最终他们选定了西安的大雁塔作为构思上海金茂大厦的原型。

中国文化深深地植入了这座钻石般精致的建筑,88层高度,8角型外观。尽管浦东高楼林立,但路人都会被金茂大厦宝塔外形所吸引。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7年第5期登载了一张照片:两个外国人坐在高空中,其中一人探出平台伸出两个手指转身做胜利状,他们身后的背景是东方明珠电视塔、黄浦江和批立的高楼大厦。照片说明写道:寻求刺激的外国人选择上海金茂大厦作为跳伞平台情有可原;这里号称“中华第一高楼”。在古老中国最具现代感的城市上空进行西方式的探险似乎意味深长——完成了古老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对接。

浦东的世纪公园,也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晶。当时,浦东要建一个140公顷的中央公园,浦东方面邀请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中国的6家设计事务所来设计。最后选定了英国的方案,据公园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朱纯宏回忆,“英国设计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与西方的大草坪结合,效果很好”。

据介绍,为设计这座公园,英国设计师们



今日陆家嘴风景线。

刘思弘摄

等待着来自上海浦东的数据。对这些数据,新华社一位记者称之为“浦东价格”。这意味着浦东正在成为全球的“定价中心”之一。

中国的浦东 世界的浦东

浦东开发中我们不只是吸引世界的资金、世界的技术,还吸收了世界的智慧。同时,在浦东开发中形成的文化是推动浦东开发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浦东开发后,大量投资者来到浦东,盖楼

2011年6月3日,赵启正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该校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主任保罗·格维兹告诉赵启正:他曾带13岁的儿子去中国。他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东边的滨江大道,正值入夜,陆家嘴璀璨的灯火深深地印入了他儿子的脑海中。

格维兹兴奋地告诉赵启正:我的儿子现在说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他一共去过中国6次,现在是大二学生,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大概有一年。我对此非常高兴,也想借此感谢您,因为是您在上海的工作让我的儿子有机会更好地认识中国。

从质疑到惊叹

浦东是“中国例外论”的代表。几乎在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西方政界人士如今梦寐以求的经济工具在发挥作用,让中国在过去的改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最初,对于浦东开发,海外不少人不好看,不理解。赵启正曾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对于浦东开发,最初的国际舆论是怀疑的,认为这是个口号而不是行动。

颇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嘲讽浦东开发就像沙俄时代为女皇建造的“波将金村”。“波将金村”是俄国波将金元帅为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在其必经路旁建起一批漂亮村庄,看上去很美,其实都是布景,里面是破败的茅草屋。“波将金村”也就成为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而历史也似乎要考验浦东。1997年,高速发展的浦东曾被亚洲金融危机狠狠地“撞了一下腰”,刚刚开始建设地基的环球金融中心大厦面临投资者要求撤资的窘境,资金链断裂,工程不得不叫停。泰国商人投资的浦东陆家嘴地区大型购物娱乐中心——正大广场也因金融危机陷入困境,汤臣集团刚刚在陆家嘴拿到了一块地,但也因金融危机苦苦请求浦东政府退地拿钱。

投资者纷纷后退,国外媒体出现“浦东开发失败”“办公楼出租率只有20%”“浦东的灯亮不起来”等描述。那时,夜晚来到浦东陆家嘴,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大批的商务楼宇建立起来,但是入驻公司少,大楼无声地矗立着,偶尔有着点点的灯光。

曾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胡炜回忆,那时到访浦东的境外人士都要问:“东南亚货币危机对中国有何影响,浦东开发还能顺利进行吗?”

这也让上海和浦东的领导高度紧张。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坦言:那段时间真的是睡不着觉。

但是浦东开发的建设者还是顶住了压力。胡炜回忆:亚洲金融危机,世纪大道建设到一半出现了资金困难,市领导亲临现场激情鼓舞建设者:再大的困难咬咬牙也要顶过去,杀出一条血路!

对此,西方人往往会很困惑,中国人为何如此顽强?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入的研究,到访中国60多次,他曾有一个奇妙的观点解释了这一现象: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是使用汉字,一个是使用筷子,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使用汉字和筷子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呢?我的看法是:汉字和筷子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严酷的要求。要记住汉字需要很强的记忆力,小孩子要学会使用筷子也很难,正因为这些民族的孩子从小就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所以他长大以后就具备了应对更加恶劣环境的能力。

鉴于大批楼宇建造起来,各类功能性企业机构进驻一时跟不上,1995年11月23日,时任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姚锡棠教授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写信,建议把位于浦西的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东迁浦东,通过要素市场东移,促进陆家嘴中央商务区的形成。建议得到徐匡迪批示肯定,也得到上海市其他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

这封信也加速了要素市场向浦东集聚。很快,在上海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各类要素市场集聚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渐成气候,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

徐匡迪回忆,经过几年,特别到了2000年完全好转,小陆家嘴全租完了,全市办公楼的租售率也超过了80%。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陆家嘴的上百幢楼里灯逐渐地亮了起来,入夜璀璨的灯火成为上海最迷人的风景。

此前曾经有外国人批评,陆家嘴的房子造得太多了,空置地厉害。浦东人则说,在中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些,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

没过几年,大量的金融机构云集陆家嘴证实了“大衣服”理论。当年已经做得大了不少的“裤子”,也变得小了。到了2005年,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林立着128幢高档写字楼,智能化办公面积达230万平方米,平均入驻率近90%,许多楼宇已一房难求。

后来担任基辛格顾问公司董事会副主席的雷默也修正了他当年的看法:浦东是“中国例外论”的代表。几乎在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西方政界人士如今梦寐以求的经济工具在发挥作用,正是这些工具,让中国在过去的改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若干年后,知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说:我认为,弗里德曼当时的(对上海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还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上海,包括整个中国,都证明了市场力量的强大。

(作者系《浦东时报》原副主编,《浦东开发》原主编,著有《浦东样本》《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等。本文资料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一书。)